



The Titan

巨人

[美国]西奥多·德莱塞 著 徐人望 徐微芳 译

译林出版社



巨人

[美国] 西奥多·德莱塞 著 徐人望 徐微芳 译

THE TITAN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人／(美)德莱塞(Dreiser, T.)著；徐人望,徐微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2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The Titan
ISBN 7-80657-432-8

I. 巨... II. ①德... ②徐... ③徐...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4642 号

书 名 巨 人
作 者 [美国]西奥多·德莱塞
译 者 徐人望 徐微芳
责任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Apollo Editions, 197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6.875
插 页 4
字 数 398 千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32-8 / 1 · 337
定 价 (精装本)23.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巨人》：虚拟交易与消费文化

(代译序)

蒋道超

从 1870 年到 1950 年间，美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工业化进程和资本积累将过去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形式转变为一个高度集中和高度机械化的形式。内战前北方相对单一化的社会形式变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一端是百万富翁和企业家，另一端是贫困潦倒的移民。虽然边疆在 1890 年才正式关闭，但当时已经工厂林立，贫民窟遍地。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心舞台已经由工业城市代替了过去辽阔的、与大草原相连成片的大农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迅速工业化发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生活达到了令世界瞩目的水准，也正是在此时，我们所熟悉的消费主义特征显而易见地表现出来。美国成了真正的消费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仅富人，就连普通人的购物都并非完全出于需要，而是因为购买可以带来娱乐和享受。例如，中产阶级家庭拼命抢购电冰箱、洗衣机和吸尘器这样的电器。男人戴手表，抽雪茄，女人买化妆品和时装。在连锁店或者超级市场里到处都可以购买到半成品食品。最能说明消费热潮的是美国人以疯狂的态度对待慢慢普及的汽车，“汽车已经不仅是运输工具，而且成为第一个风靡

全国的消费品。”^①

为了刺激对消费品的需求，广告机构和分期付款方式也有长足的发展。广告商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提供信息，而且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经纪人；他们在为产品做广告时赋予产品魅力和影响力”。结果，消费社会中人的想像力在极大程度上被广告所塑造和限定，广告“教会了人们根据商品市场来定义自己的需求和生活风格”，而且表明“资本主义和美国主义在一种被称为‘美国制度’中连在一起不可分割”。^②美国制度即使受到了来自激进主义者和个人不满者的攻击和批评，仍给人一种完美无缺的感觉。

因此，这些广告不仅包含经济目的，而且具有政治意图。它们直接为消费意识形态服务。换句话说，它们帮助人们建立适合新兴的意识形态的意识，与此同时，侵蚀旧的意识形态以及支持它的价值观。消费社会“强调花费和物质占有，在削弱传统的勤俭、节约、自控和冲动的价值体系”。丹尼尔·贝尔声称，大众消费“导致了清教主义和新教伦理的衰落，使鼓吹享乐和满足为生活方式的消费享乐主义得以兴起”。^③德莱塞《欲望三部曲》的第二部《巨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反映了作者对待消费意识形态的复杂矛盾的态度，以及他与主流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

—

《金融家》集中考察了强盗式的资本家考珀伍德的情爱以及生

① Richard N. Current, T. Harry Williams, Frank Freidel, Alan Brinkley, *American History - A Surve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p. 714—715.

② Michael Parenti, *Inventing Reality: The Politics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6, p. 65.

③ Michael Spindler,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 William Dean Howells to Arthur Miller*. Hong Kong: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 p. 108.

意历程。他那英雄般的高度一直在吸引着读者，使他们羡慕不已，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德莱塞批评了考珀伍德式的违法乱纪不道德之举。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德莱塞要么是个拥护新的消费意识形态的革命者，要么是个拥护生产意识形态的保守分子。他在《金融家》里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待新的消费意识形态的复杂态度：在总体上说，他是赞成与新的意识形态相关联的越界行为，但又担心这种越界行为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性，所以就对它们进行某种程度的抑制。实际上，他在无意识当中代表了对社会秩序调整的观点，使它更加稳定和安全，适合新的发展。当然，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一种社会秩序是不存在的，因为通常都是各种不同社会结构同时并存。“任何具体的社会都混合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体性，而这个领域倾向于形成一个不均匀的需要不时调整的整体，在这个结构中，大多数意识形态都呈现一种不平等的相对于占主体地位的意识形态来说是附属地位的状态”。^①所以，德莱塞在表现他的主人公越界传统的界限时其实是在改进和稳定主体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德莱塞是社会的一分子，他的主体性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因此难以逃脱各种文化的假定。他所处的文化特征是“不择手段的生意法，包括贿赂政治家，践踏别人的财产权，抬高投资股票，甚至敲诈勒索，赞成‘必然平等’的社会法律原则，将那些升至高位的人拉下来”。^②德莱塞这种矛盾心态在《巨人》中依然存在，不过在这里重点放在了公开鼓励消费主义文化上。

《巨人》描写考珀伍德在芝加哥成功地控制了地下铁路系统，但最终被敌对势力驱逐。考珀伍德到达芝加哥时，城市高大建筑

^① Frank Lentricchia,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311.

^② Irene Gammel, *Sexualizing Power in Naturalism: Theodore Dreiser and Frederick Philip Grove*. Galgaly: University of Galgaly Press, 1994, p. 155.

物的空中轮廓使他非常激动，因为它正形成了考珀伍德权力上升的背景。事实上，连德莱塞自己也在赞扬芝加哥的喧嚣繁华，感到与费城的沉静截然不同。考珀伍德通过种种欺骗手段和伎俩获得了交通特许权后，他的财产聚集到两千万美元，他广泛的艺术品收藏成为全国之最，他的权力事实上已经大得不可遏止。但他和艾琳仍然进入不了芝加哥的社交圈，因为有关他在费城被捕的传言已经散布到芝加哥，另外人们认为艾琳缺乏优雅风度。这后一个原因使他非常痛苦，因为考珀伍德在旅行中见过欧洲社交名流超群脱俗的风度。所以他开始对艾琳表现出不满，并开始不懈地寻找能拥有各种品德以适合自己的理想女人。可以说，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叙述考珀伍德的浪漫冒险活动。

德莱塞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他在毫无节制地描写男女乱交，并指出德莱塞这么聚焦在性乱交上是因为他已经“把自己与女人的经历都归咎在考珀伍德身上”，并“第一次创造出能和他自己性冲动相提并论的男主人公”。^①有些批评家说男主人公的性冲动可以为他的经济权力争斗提供性动力，这反映在他“有磁性的”身体形象上。约翰·奥尼尔评论说：“在这种意义上，他的性与他在生意上所感觉到的快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生意中他控制的符号意义是永远也不会失去的。”^②情妇和性乱交，迈克尔斯说，代表经营者精神上的操纵和“虚拟的交易”。迈克尔斯把考珀伍德的妻子莉莲和情妇艾琳置于两个极端。莉莲“昏昏欲睡的样子”和“漠不关心使考珀伍德觉得在性上有一种绝对安全感”，而他情妇艾琳浑身充满了朝气，在性上慷慨大方，这代表了股票市场交易的不稳定和稍纵

^① Lawrence E. Huszman, Jr., *Dreiser and His Fiction: A Twentieth-Century Ques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3, p. 8.

^② John O'Neill, “The Disproportion of Sadness: Dreiser's *The Financier* and *The Tita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3, p. 421.

即逝。^①所有这些观点可能都有些道理,但它们都忽视了《巨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德莱塞表现了消费文化和享乐主义。德莱塞1914年开始创作《巨人》时,美国妇女有很好的理由进行消费:传统的观点要求“女人的责任就是生养孩子”,而且“女人生来就适合为人妻为人母”,但她们自己发现有必要享受性生活,打扮自己使她们更有性感,更迷人。“她们注重化妆品和诱人的服装,好使丈夫心中喜欢;她们还极力阻止孩子干涉她们的婚姻生活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她们不仅仅把她们和丈夫之间的性生活看成是为了生养后代,而且把它看成是一个重要的快乐的经历,是浪漫爱情的高峰”。^②因此,她们的注意力放在与男人的关系上,结果,这种思想导致了很高的离婚率。在《巨人》中,我们有一个记忆犹新的事实:考珀伍德和一系列的女人结婚或者同居,但只生了两个孩子,而且对他们很少提及。可能作者的目的也许是要描写她们是作为享乐一群的人,考珀伍德和她们保持的大多是不合法的和不正当的性关系。我们可以结论说,他在这部小说中所刻画的女人是被看成了可被消费的物,而对性乱交的描写是用来表现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文化,而不仅仅是在描写道德堕落。

消费意识形态鼓励一种商业文化,其目的是诱导人们或者鼓励人们最大限度地消费,它所建立的道德标准是有钱建豪宅,买最昂贵的服装,受到最美的女人的青睐就是道德完善的,最有价值的,因为这时的物品,正如鲍德里拉所说,已经成为象征人们的地位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最基本的要求了。帕伦蒂(Parenti)指出:

^① Walter Benn Michaels, “Dreiser’s ‘Financier’: the Man of Business as a Man of Letters,” *American Realism: New Essays*. Ed., Eric J. Sundquis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79—280, p. 293.

^② Richard N. Current, T. Harry Williams, Frank Freidel, Alan Brinkley, *American History – A Surve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p. 717.

消费意识形态不仅捏造假的需求；而且以虚假的方式引出真的需求来了。需要友谊、爱情、赞同、享乐，逃避乏味和厌倦，为自己和家庭找到安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人们所最关心的问题。消费意识形态的有害性还远不止是刺激我们挥霍消费的强烈愿望。就像媒体中许多其他东西以及其他虚假意识一样，消费主义以欺骗而最终又使人无法满足的方式利用人的真实需要。^①

至于消费文化的起源，科林·坎贝尔在《浪漫主义的伦理》中说，消费文化起源于人对物质不可压制的愿望。他声称，传统享乐主义“意在使物品的物质性作为减轻不适的手段”，而现代享乐主义则“意在把物品想像为一种令人挖掘愉快的不适状态”。^②也就是说，现代享乐主义者“一遇见现实就不断地撤退，总是将白日梦放在未来，把这些梦想依附在对物的渴望上，然后，一旦这些物被拥为已有和被体验过，就把这些梦从物品上移开。^③所以，坎贝尔说，“延迟满足和压制情感一起产生了强大丰富的、想像的个人内心生活，这是浪漫主义个性和现代消费主义者的必要前提条件。”^④

三

德莱塞并不是唯一一个反映消费意识形态的作家。事实上，

① Michael Parenti, *Inventing Reality: The Politics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6, p. 65.

② John Brewer, Ray Porter, ed,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25.

③ Colin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pp. 86—87.

④ Colin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pp. 222.

自然主义流派的斯蒂芬·克兰、弗兰克·诺里斯和其他一些作家都在重要的意义上反映过消费意识形态。一位批评家在评价自然主义时指出：“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学毫无疑问受到二十世纪来临时的历史变化的影响：城市消费市场的大规模拓展（主要吸引了妇女，伴随着的是享乐意识形态），新妇女的出现（她们在世纪末提出了性权利和专业权利），以及随后而出现的男性危机（要保护传统形式的男性权利和权力）。”^①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其他作家也反映了这一意识形态，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保守的，意在探索性的。他们作品中的基本调子仍然与传统的道德社会法则是相一致的。特别当他们处理性问题时还是过于小心翼翼。

与这些先辈以及同时代作家相比，德莱塞不仅直率地描写性乱交，而且使它成为小说中的突出主题。具体地说，他的成就就在于他无畏、真实地再现了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妇女作为情妇，作为艺术品，也作为消费品的情景。他把妇女和服装以及大厦等同起来。在《巨人》中，女人既是一个能消费的主体，也是一个美的被消费的客体。“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正式’开始，女性的性行为已经在自然主义小说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般来说，自然主义小说展现男性作家、叙述者和人物在观察、检查和构架女性的性行为和身体。”^②有人认为德莱塞只把妇女看成了性的目标，她们无法拥有自己的身份和作用。实际上，大厦、美女和衣服不仅是满足人的欲望的东西，而且可以代表人的社会地位、权力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满足自己。

德莱塞时代的妇女的地位仍然很低，她们被看成和消费品的地位一般。她们被看成是抽象的、见色思淫的目标，而不是实实在

① Irene Gammel, *Sexualizing Power in Naturalism: Theodore Dreiser and Frederick Philip Grove*.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1994, p. 3.

② Irene Gammel, *Sexualizing Power in Naturalism: Theodore Dreiser and Frederick Philip Grove*.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1994, p. 2.

在的性交目标，妇女的身体象征着日益复杂的消费经济。所以，有人指出，在“德莱塞的《嘉莉妹妹》(1900)和伊迪斯·沃顿《幸福之家》(1905)中，美国人处理性活动时更多地是强调性活动是一种社会差别的标志：资产阶级的性活动比无产阶级的性活动典雅和艺术。”^①为了把妇女维持在这样的低等位置上，社会使用了一系列技巧来调节和控制她们，所采用的不是暴力的行为，而是使她们的身体更驯良和多产。社会秩序是通过不断地使用对比、奖励和惩罚等手段维持的。至于现代驯化人的技巧，福柯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使用了一个十八世纪的监狱模型来说明现代权力运作。那个圆形监狱里有一个塔，四周分布的是狱舍。通过塔上的窗口，监视的人可以看见囚犯们的活动情况，但囚犯们却看不见塔中的监视人，所以他们就一直怀疑有人在监视他们。既然怀疑自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下，囚犯们必然将这种监视内化，结果也使监狱的纪律内在化了。因此，囚犯们做到了自己驯化自己：“没有必要使用武器、暴力和物质上的限制。只有监视。一个监视的盯梢，处于这种盯梢下的个人结果将它内化，自己成了自己的监督，每一个人都对自己实行监视。”^②

在《巨人》中，实际上在许多自然主义的作品中，这些统治的手段比比皆是。使用空间分割和分类的技巧，“自然主义作家创造出的世界让人注意到福柯权力规范人的概念。这一权力规范通过让他们屈服的技巧构建个体，调节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依靠这样的梯状划分，现代权力不是从等级的最高层开始工作，而是遍布于社会网络的每一个角落，每时每刻都通过包容和排除来革新等级制

^① Irene Gammel, *Sexualizing Power in Naturalism: Theodore Dreiser and Frederick Philip Grove*. Galgary: University of Galgary Press, 1994, p. 4.

^②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80, p. 155.

度。”^①考珀伍德统治的原则也不是靠粗鲁地压制反抗和对立，而是聪明地利用人的兴趣、无意识、空间等方式进行权力运作。

也就是说，考珀伍德虽然渴望越界社会的界限，但实际上同时也在努力建立起专利者新标准。事实上，

德莱塞和格罗弗的自然主义记载下新的规范性的约束，为男性特权在生理或者心理角度寻找“正常规范”的辩护理由。自然主义小说常常打破传统对性活动的定义，但它参与建立新的文化标准……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主义作家扩大性活动的特殊模式，把它们划分为正常的和非正常的、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性行为。他们常常把卖淫和疾病、纵欲和惩罚、正常的性行为与异性爱联系起来。他们的文学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是经常瓦解中产阶级的标准，而是常常起到了“规范性”的作用。^②

考珀伍德对人民大众毫不掩饰的鄙视是与他对待女性的态度相联系的。他第二个妻子艾琳就被看成是个大众的一员，不仅因为她是爱尔兰的后裔，而且因为她是女的。考珀伍德最后对她的看法是：“没有艺术性”，“像奴隶一样”，因为她愿意为他做出牺牲。把艾琳和芝加哥民众并置在一起，德莱塞着重要读者明白这些人都以一种同样的方式处于考珀伍德的权力掌握之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爱恨交替的关系，总是产生出一种痛苦的快乐。在德莱塞构建的宇宙里，那些弱者在性上被强者所吸引，而强者则没有丝毫的民主之风。

^① Irene Gammel, *Sexualizing Power in Naturalism: Theodore Dreiser and Frederick Philip Grove*.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1994, pp. 45—46.

^② Irene Gammel, *Sexualizing Power in Naturalism: Theodore Dreiser and Frederick Philip Grove*.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1994, p. 11.

四

因此，我们也不难发现《巨人》中空间调节女人地位的规范性作用。如果我们注意到女人活动空间范围的规则性，我们就会看出她们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活动的。具体地说，女性常常是在家这个圈子里活动的。例如，艾琳虽然天性活泼大方，充满活力，也是被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内活动。我们常常看见她在家里乔装打扮或者在担心丈夫抛弃自己。只是在考珀伍德要求她陪同他前往伦敦时她才获得了较广泛的空间活动。即使如此，考珀伍德只是利用她作为掩护，害怕他和弗莱明之间的隐情被报界发现，导致他生意上的失败。与此同时，她还是在他所聘请的“间谍”监护下活动的。至于贝雷尼切·弗莱明，她似乎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她在妇女中有点特别。她是考珀伍德最理想化的人物，大概也是作者自己心中最理想化的人物。

如果我们注意到了德莱塞小说中女性的低下地位，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他的《巨人》中，考珀伍德不仅是艺术品的拥有者，而且是一系列女人的主人。他的妻子和情人是作为地位的象征而塑造的：“对女人的征服必然成为考珀伍德这种人活动的一部分，因为在渴望更多的占有和更多的权力刺激下，他所征服的芳心的数目对他来说就是不断的满足和放心——女人是他权力的象征，可以看得见的成功证据。”^①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女人首先是消费者，然后才是消费品。众所周知，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有钱的男人精力和时间都被消耗在生意上，于是，他们就让太太和女儿们去参加上流社会的舞会和娱乐活动，从而她们成了报纸和媒体猎奇

^① Burton Rascoe, *Theodore Dreiser*. New York: Robert M. McBride & Company, 1926, p. 49.

的对象。所以，考珀伍德生活中三个重要的女性依次符合了十九世纪美国的美的标准。考珀伍德第一个妻子，莉莲，拥有“花瓶般的美”，使人想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的偶像——柔弱的、贵妇人似的美。但这种温室里的百合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受到了挑战，代之而起的是丰满艳丽型的美的偶像。考珀伍德第二个女人艾琳·巴特勒就正好符合了这个美丽偶像。她天生给人以美感的享受。但到了1890年前后，运动员似的、天生丽质的女性成为美国美的偶像，代替了丰满艳丽型的女性。这时的考珀伍德将注意力从艾琳身上转向了贝雷尼切·弗莱明身上。因为弗莱明形体是运动型的，而且非常自信。但她也和其他几个女人一样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考珀伍德。在展现这一系列女性偶像中，作者混淆了妻子和情人之间的界限，就像考珀伍德聪明地将女人的身体为他所用一样。考珀伍德在向贝雷尼切·弗莱明表示爱情时直言不讳地告诉了我们他对女人口味的变化：

我第一个妻子是长老会女教友，笃信宗教，拘泥习俗，她比我大六七岁。我幸福了几年——五六年，我们生了两个孩子——都还活着。后来我遇上了现在的妻子，她比我年轻，至少小十岁，长得很漂亮。她在某些方面比我第一个妻子聪明——我觉得至少不那么拘泥习俗而比较大方。我热烈地爱上了她，当我终于离开费城时，我就同前妻离婚，同她结婚了。当时，我非常爱她，认为她是我的理想伴侣，现在我还认为她有许多吸引人的优点，但我自己关于理想女人的观念一直在慢慢改变。通过种种经历，我渐渐明白，她根本不是我理想的女人，她不了解我。我并不自以为了解自己，但是我想，什么地方也许会有一个比较了解我自己的女人，她会在我身上看到我自己看不到的东西，而且至少会喜欢我。我不妨告诉你，我一向喜爱女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

我想要的女人。”

考珀伍德的自白显然揭示了他是从男性的角度看女人的，他只是把女人看成艺术品。那么，一旦艺术品过时了，对他不再有吸引力了，他就会去追求新的理想。结果，他第二个妻子艾琳，“确实很美，是一件光辉灿烂、令人心旌摇荡的 object d'art(艺术品)”，被介绍给芝加哥的“观察者们”，社会名流们把她当成艺术品一样对她评价判断。为了进一步强调女性是一种可表现的艺术品，在艾琳“还年轻”，处于美的顶峰时，考珀伍德请人给艾琳画了一幅画像。这幅像成了他收集的艺术品的一部分，被挂在一幅东方浴后裸体画旁边。裸体画恰如其分地映照出艾琳的画以及真实的她。就如杰罗姆的闺房里的妻妾群暗示出男性当权者拥有众多的女性一样，所以，艾琳的画实在是赞美性的活力，因此，吸引了一大群男性观望者——考珀伍德生意上的朋友和对手，都在梦想着与她在一起的性的快乐，但同时也意识到生活中“缺少”这种快乐，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被锁定在与“冷冰冰”、“占有欲很强的”妻子的“传统”婚姻关系中。将两幅栩栩如生的画像并置在一起使人注意到两幅画中真正缺少的东西：作为画的拥有者以及女性身体的“主人”的男性不在。考珀伍德战胜了在座的所有男性观赏者。他们意识到考珀伍德才是他们在画上所羡慕的女性身体的唯一拥有者。作为画廊的拥有者，考珀伍德代表了美的爱好者，同时，也是集主人—收集者—拥有者于一身的人。

代表某一段时间美的偶像，或者换句话说，代表某个时期的潮流的女人一旦全盛期一过，就难以满足人的口味和欲望，那么也就过时，不被欣赏，甚至被抛弃。所以，艾琳不具备性的魅力后被打入冷宫，就在情理之中了。在题为《考验》的一章中，艾琳得不到芝加哥社交圈的接受，被认为“太浮华卖弄了”，太“俗气了”。考珀伍德在芝加哥的失败也被归因于她而不是他自己，因此，她付出了

代价。她不仅遭受到了芝加哥名流们的奚落和冷遇，而且考珀伍德这时已经心系其他更漂亮更有吸引力的女人了。艾琳被社会所排斥，与外面的世界接触很少，然而考珀伍德却被社交圈所接受，在生意上颇为活跃，可谓春风得意。这里可能的解释是艾琳作为一件商品，一件艺术品已经出过了风头。当她风华正茂，千娇百媚，可以给丈夫带来声望，给那些观赏者带来愉悦之时，她价值连城，但既然她已徐娘半老，对他们没有用了，她就被像一件物品一样丢弃。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部小说里，女人和艺术品收藏是等同的，推而广之，女人就是艺术品，就是消费品。我们可以声称，考珀伍德后面一长串的妻子和情妇暗示的与其说是性还不如说是审美的变化，与其说是色情上的亲密还不如说是性能力的游戏，跟他不断改变的艺术收藏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他对女人孜孜以求表明了他不断变化的欣赏和审美口味。《巨人》确实把权力和艺术连在了一起。考珀伍德承认名誉、权力、艺术和精力的最终目的就是美，不过，考珀伍德追求美又表现出他渴望融入潮流，得到尊敬和羡慕。

由此可见，考珀伍德在整个三部曲中从一个女人到另一个女人，寻求美，寻求满足。有些批评家把这种倾向看成是原始欲望的满足，其他批评家把此看成是对资本主义暴力的批判。我则认为这表现了世纪之交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众所周知，物品总是被希望得到改进，因为改进了的就会更加悦人心意，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则更强。古代的消费品多是用来满足人的最基本需求，尤其是物质上的需求，但不同于这一点的是，现代的消费品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的需求了，更重要的是表明人的社会地位。居住在现代都市里，人们难以互相认识，很难引起对方的注意，于是，人们不得不使用象征。斯平德勒(Spindler)说过：

在他长大的典型的小社区里，他的社会地位人人皆知，但在匿

名的大都市里，他的社会地位必须通过能立即认出来的符号来标记。另外，郊区居民的无根性以及工作的流动性迫使他完全依靠金钱地位树立自尊和自我，表明这种地位的通常符号是他能获取和显示的耐久的物品。地位系统是个在不断变化的等级制，这与隐含的阶级认同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那些符合了消闲阶级口味的商品才被认为是慷慨的。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广告商在广告中激起人的需求，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趋向于模仿那些似乎日子过得很好的人。^①

既然考珀伍德将女人和商品混为一谈，那么，他不断地更换女人，每一个人都满足他的一个方面的要求，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不足为奇了。

美国新批评派曾经说过，作家在选择写作材料时总是有自己的偏好。德莱塞在写作中自然也做过材料上的选择，选择符合他的要求和目的的材料。从历史上看，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美国出现了消费主义，但人们对它的态度是多种多样的，激进派热情地拥抱它，毫无疑问地就接受了它，但保守主义者却反对它，仍然坚持传统的行为准则，认为新的潮流是对旧的“美德”的玷污。也就是说，“对消闲阶级的兴起，中产阶级的嘉许和谴责并重”，因为“这反映了他们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消闲阶级所代表的享乐消费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②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德莱塞选择了代表这一冲突的主题，并在无意间显露出自己的偏好。结果，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一部给人提供愉悦的纯文学作品，而且是典型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广告词。总体说来，它表

^① Michael Spindler,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 William Dean Howells to Arthur Miller*. Hong Kong: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1983, p. 117.

^② Michael Spindler,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 William Dean Howells to Arthur Miller*. Hong Kong: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1983, p. 112.